

玛利亚·莱昂扎:委内瑞拉民族建构的“三合一”符号^{〔*〕}

严 庆, 孙铭晨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要〕民族建构需要多民族国家建设者的恒常努力。民族建构通常会依托具有团结、凝聚与整合意义的象征符号。作为拉丁美洲新兴民族国家之一的委内瑞拉民族建构的基点是整合国内的三个族裔——西班牙后裔、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裔。玛利亚·莱昂扎塑像集三个族裔群体元素于一体, 体现出民族建构的符号功能与象征主义。

〔关键词〕认同与建构; 国家认同; 符号主义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1. 04. 022

对于新兴民族国家而言, 民族建构的任务通常较为繁重。伴随着 20 世纪初期拉丁美洲兴起的“国族一体化”^{〔1〕}的建构浪潮, 委内瑞拉总统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于 1949 年提出了“新国族理想”(Nuevo Ideal Nacional), 该构想主张创造一种新的国民意识, 将全体委内瑞拉人民整合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进而实现社会全员的深度团结和民族国家认同。在此背景下, 1951 年希门尼斯总统下令建造玛利亚·莱昂扎塑像。塑像由委内瑞拉当时最著名的印第安人雕塑家阿莱杭德罗·科里纳设计完成, 地址选在首都加拉加斯, 具体位置则位于委内瑞拉中央大

学东高速路正门附近。在内容上, 玛利亚·莱昂扎塑像体现了委内瑞拉三个族裔的结合: 塑像主体是印第安女性的裸体形象, 脸庞是印欧混血形象, 健硕的肌肉似乎象征非洲裔; 双臂高举女性盆骨, 骑着印第安人崇拜的中美獾, 脚下踩着蟒蛇。^{〔2〕}塑像融合了委内瑞拉各族裔的特征, 集印第安文化、西班牙文化和非洲文化于一体, 象征着委内瑞拉民族构成成分的多元和委内瑞拉国家的民族团结。本文围绕莱昂扎塑像的建造, 探讨其民族建构象征性意义的内涵与机制, 并就当代民族国家建构实践中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及其认同展开分析, 从而获取有关多民族团结与现

作者简介: 严庆,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多民族国家建设与民族事务治理研究; 孙铭晨,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2019 级民族政治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 多民族国家建设。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研究”(18JZD054) 的阶段性成果。

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般性启示。

一、历程与流变：委内瑞拉的民族国家建构及其族裔问题

委内瑞拉的族裔问题是在其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逐步产生的。1498年，哥伦布第三次航行美洲发现了委内瑞拉。由佩雷斯·德·托洛萨开始，西班牙殖民者展开了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征服，城市和领地村建立起来。1777年，西班牙王室设立委内瑞拉都督区，并成为现今委内瑞拉的建立基础。从西班牙人开始定居到1811年委内瑞拉获得独立，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在三百年来的共同生活中，经历着种族混血和文化碰撞，最终形成了族裔多元、文化多元的委内瑞拉新民族。

（一）族裔与文化的混合

印第安人是委内瑞拉的原住民。15世纪末，委内瑞拉大约分散居住着38个印第安部族，人口在30万至100万之间。^[3]随着西班牙人的入侵和非洲黑奴的引入，委内瑞拉开始经历三百年的种族混血以及文化碰撞。

从16世纪中叶开始，参与建城有功的西班牙殖民者开始拥有在城镇建造房屋并占领周边土地的权力，被掠夺的印第安人被迫在这些土地上定居和劳作，并被西班牙人领主管理“教化”，殖民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领地制由此建立起来，印第安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则发展成领地村，与此同时，大领主还会购买黑人奴隶用来从事农业劳动或留在家中当仆人。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经济生活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的密切接触提供了条件。在社会关系与社会规则方面，西班牙王室颁布了《西印度群岛法》，允许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通婚，但禁止西班牙人或印第安人与黑奴通婚。尽管是以非法的方式，被禁止的两类通婚还是经常发生。^[4]通婚导致大量的梅斯蒂索人^[5]、穆拉托人^[6]和桑博人^[7]等混血种人快速繁衍。1687年，委内瑞拉废除“领地制”，领地村也随之

消失，原先定居其中的印第安人大多融合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由此，各族裔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混血程度日益加深。到了18世纪，混血人种的比例大约已占到委内瑞拉人口的一半，^[8]委内瑞拉混血民族基本形成。

血缘上的联系虽不能消弭殖民征服所带来的族裔冲突，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上述三个族裔群体的文化碰撞。西班牙殖民当局强迫印第安人和黑奴学习西班牙语和改信天主教，起初遭到了反抗，但随着各族裔共同生活的程度越来越深，强制同化与个人发展的社会成本降低效应叠合，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要想有上升的机会，黑奴要想卖出高价，就必须掌握西班牙语，结果是西班牙语很快得到普及。语言的同化加速了天主教的传播，加上宗教裁判所的残忍迫害，印第安人和黑人不得不在反抗中作出妥协，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此外，西班牙人也需要“入乡随俗”，尤其到了18世纪，殖民地的土生白人与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他们逐渐养成了有别于半岛人的生活习惯，对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的态度也日趋宽容，西班牙文化、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在不断的冲突、适应和融合中形成了一种“三元一体”的混合式文化。虽然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对于委内瑞拉文化的形成起不到决定作用，但它们却赋予委内瑞拉文化以独特性的因素。

（二）民族独立与族裔意识觉醒

委内瑞拉的独立战争是由克雷奥尔阶层^[9]领导的。克雷奥尔人是早期西班牙征服者的后裔，他们拥有土地、把持市议会，系殖民地的实际领导者。虽然克雷奥尔人与不断经王室任命而来的半岛西班牙人同属西班牙的臣民，但殖民地的世代生活让克雷奥尔人对委内瑞拉产生了“家园”般的归属感。殖民初期，克雷奥尔人与半岛人的利益基本一致，但到了18世纪，克雷奥尔人与半岛人的矛盾日益凸显，冲突不断，既体现为殖民地贸易为西班牙王室垄断，又体现为殖民地高级职位多为半岛人霸占，这些做法激起了克雷

奥尔人的不满与憎恶,同时也加剧了他们与母国的分离:唯有委内瑞拉独立,才能使权力归属克雷奥尔阶层,他们认为自己才有资格在这片土地上享有和行使权力。法国大革命和北美独立运动的胜利则进一步刺激了克雷奥尔人的独立情绪,他们产生了与西班牙人的民族意识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意识,而1808年法西战争的爆发致使斐迪南七世被迫退位,殖民地的统治阶层以追随斐迪南七世为借口,纷纷宣布独立,脱离宗主国的统治,1811年7月5日,委内瑞拉正式独立,建立共和国。但在接下来的近20年里,委内瑞拉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国家始终处在急遽的变革之中,委内瑞拉的国家意识、新的民族意识还相当孱弱,而且可能只存在于克雷奥尔人之间。委内瑞拉历史科学院院士吉利尔莫·莫隆认为,必须认识到,独立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民众运动。人民对独立并不感兴趣,他们是在跟着地方首领行动。^[10] 委内瑞拉社会学家劳雷亚诺·巴列尼利亚·兰斯也认为,独立战争时期,在委内瑞拉民众的心里,是没有“祖国”这一概念的,参加独立战争的民众与其说是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不如说是等待被付钱的雇佣兵。^[11] 可以说,除了克雷奥尔阶层,广大民众并没有对新独立的国家产生强烈的国家认同,委内瑞拉的民族意识也还十分薄弱。因此,加强各族裔对委内瑞拉的国家认同是独立后精英统治阶层的重要任务之一。

族际矛盾的激化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苏醒。委内瑞拉的族际矛盾是其沉重的殖民历史遗产,血腥的武力征服,沉重的劳役、赋税,再加上肆虐的瘟疫,让印第安人人数骤减,黑人奴隶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族裔压迫激起了印第安人和黑奴的顽强抵抗,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矛盾日益激化,种族区隔意识不断加深。生活在城市的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大多是手工业者、商人或小农场主,财富的累积让他们萌生了谋取权力的想法,但克雷奥尔人的不断打压,切断了他们向上攀升的渠道,不平等的社会关

系成为混血人群与克雷奥尔人矛盾对立的根源。

1830年以后,克雷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开始主导国家建设。在整个19世纪,地方考迪罗主义^[12]盛行,国家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四分五裂。跟着考迪罗向中央政府发动战争的是游离在社会边缘的印第安农民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自由”黑人。进入20世纪以后,委内瑞拉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取得一定成效,中央集权加强,地方考迪罗主义消失。然而,这些公共物品的提供并没有覆盖所有族裔群体和阶层。共和国虽然赋予了印第安人以公民权利,并在1854年废除了黑奴制,但生活在偏远村落的印第安人和一直遭受种族歧视甚至隔离对待的黑人,在很大程度上根本享受不到公共物品对生活的改善,他们被排除在社会联盟网络之外。统治阶层仍旧视他们为缺乏文明,甚至是需要被防范的危险对象。

1920年以后,委内瑞拉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政治生态也随之改变。石油开采改变了委内瑞拉的经济结构,农业和畜牧业不再具有重要地位;1929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及全球,对一直依赖国际市场的拉美各国经济冲击巨大,为此,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拉美各国纷纷走上工业替代进口的新经济道路。委内瑞拉开始大力发展石油工业,石油经济的繁荣和劳动力市场的不足,引发了全国的移民浪潮和城市化进程。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印第安农民移居城市。19世纪30年代,委内瑞拉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4%,到了1957年,已经占到44%。^[13] 随着印第安人和黑人开始迅速而广泛地融入委内瑞拉主流社会,这些原先一直处在社会底层的阶层,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关切自己的权益。融入城市的印第安人向精英集团提出权利诉求,留守传统公社的印第安人也组织起来对抗政府侵占土地的行为。印第安人与主体社会之间的对立情绪在不断爆发的民众主义运动中愈发强烈,引起各方关注。在此背景下,加强族裔团结和社会团结,实现各族裔

的国家认同就成了委内瑞拉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紧迫任务和社会共识。

二、符号与意义：莱昂扎塑像的建造及其象征性功能的拓展

委内瑞拉的国家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其民族(nation)建构的过程。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经历持续数百年的融汇,逐渐从生理层面渗透到了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这为委内瑞拉民族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载体和纽带。然而,要使各族裔对这一新兴的民族共同体产生认同,还需要扩大民族意识的外延。在这种背景下,建造一个可以寄托和凝聚各族裔情感的莱昂扎塑像,在逻辑上就显得合理且必要。

(一)社会思潮的演化:从“国族一体化”到“新国族理想”

独立战争播种下委内瑞拉的民族意识,但正如前文所述,委内瑞拉的民族意识一开始只存在于克雷奥尔统治阶层中间,为了维护自己在殖民地的利益,他们以“共同利益”为口号,将各个族裔的民众动员、联合起来进行反殖民压迫的斗争。独立之后,克雷奥尔阶层所倡导的共同利益并没有覆盖到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印第安人、黑人群体获得了自由,却没有获得平等,这是阻碍委内瑞拉社会团结和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到墨西哥国族一体化模式的影响,回应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委内瑞拉官方和知识界开始重视广泛培育委内瑞拉人的民族意识,激发和加强各族人民对委内瑞拉的国家认同。1949年,希门尼斯提出“新国族理想”,一方面,促进政治整合,即利用国家的自然资源来改善当前委内瑞拉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极少受到青睐的群体。^[14]希门尼斯政府还希望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现代化进程,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并以此服务于现代国家的政治整合。安德烈亚斯·威默在《国家建构》一书

中将提供公共物品作为政治整合和国家建构成功的一种机制。他认为,公共物品(道路、学校、医疗服务、清洁用水等)能产生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联盟网络,整合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个人。^[15]换句话说,如果国家能够跨越族群界限,平等地提供公共物品,那么社会各族群就容易对国家的公权力产生政治忠诚和政治认同,国家建构也会较为成功。另一方面,促进文化认同,即利用我们的历史遗产作为道德价值观的来源,^[16]也就是将委内瑞拉的历史作为道德准则,通过重新诠释传统文化,让各族群认识到彼此在宗教传统、历史记忆、民间习俗等方面的联系和共性,从而加强他们对委内瑞拉共有文化的认同。共同文化的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共同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内在凝聚力量,尤其对于新兴国家而言。

具有符号意义与价值的文化作品从未在民族建构的工程中缺席。对于所有年轻国家而言,在不断建构有关集体想象的时期,对文化进程进行政治控制是各国政府的一个优先选项。^[17]科罗尼尔·费尔南多认为,旨在产生和维护“集体统一之形象,在文明发展中扬帆起航”的新国族理想,它的实现基于政府对国家历史、宗教以及民俗文化的政治控制。^[18]为此,一系列围绕民族英雄、印第安人酋长以及作为地区和国家守护神的国家象征符号被创造出来。^[19]玛利亚·莱昂扎塑像就是后一种情况的生动例证。该塑像是在国家自上而下式的行政手段推动下完成的,体现了官方和知识界建构有关集体想象的共识。而政府之所以选择莱昂扎作为国家象征符号,是因为有关她的传说及信仰就体现了委内瑞拉族裔多元和文化多元的民族特性。

(二)玛利亚·莱昂扎传说的内涵演变与空间扩散

玛利亚·莱昂扎具有长久的文化印记,其传说要追溯到15世纪(西班牙人到达美洲大陆之前),那时,居住在现今亚拉奎州的印第安人信奉雅拉女神(Yara),视她为自然之神、大地之母。

关于雅拉的传说,有许多版本。在各种版本中,她都十分美丽,浑身散发着兰花的香气;有着湖水般碧绿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宽大的臀部和甜美的笑容;她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能与动物交流。有关雅拉最早的传说版本叙说她原是印第安人的公主,长大后,被一条爱慕她的巨蟒绑走,带到湖底,从此,雅拉成为了印第安人的爱神,以及河流和自然的保护神。可见,于当地的印第安人而言,玛利亚·莱昂扎(雅拉)既是群体的根性记忆,也是群体认同的认同渊源。

在西班牙人殖民期间,雅拉传说被“赋予”了新的版本和新的故事。在新版本中,雅拉继续是印第安人公主,并以印第安人使者的身份出现,与西班牙入侵者进行和平谈判。西班牙殖民者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雅拉试图劝说入侵者放弃侵略,但谈判没有成功。这时,雅拉有了西班牙语姓名,叫玛利亚·莱昂扎(María Lionza)。在西班牙语中,玛利亚是圣母,莱昂扎是美洲豹。雅拉在与西班牙人谈判失败后隐居山林,化作了山神。20世纪初,在莱昂扎崇拜从亚拉奎州扩展至全国的过程中,她被塑造成了一名西班牙人。她出生在西班牙,在前往委内瑞拉的海上航行中,遭遇了飓风。后被一队印第安人所救,来到奇瓦科阿(位于亚拉奎州)。在那里,她向印第安人传授知识和技能,成为了当地部落酋长的妻子。^[20]

可见,传说中莱昂扎的身份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不断地演变。最初,莱昂扎(雅拉)是山川河流之神,是自然的保护神,她像母亲一样保护着印第安人以及他们的土地,自然会得到印第安人的崇拜;后来,莱昂扎变成印第安人和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的和平使者,继续守护并延续着印第安人的文化与精神;最后,莱昂扎又多了一层西班牙人身份,她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也变成新背景下的互助关系。从此,莱昂扎不仅仅是委内瑞拉印第安人的守护神,也得到西班牙白人的尊重与爱戴。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进程的变化中,这种看似无意识地往莱昂扎身份里加入新成分的

举动,其实反映了委内瑞拉人内心深处潜藏着的观念的转变,他们开始慢慢接受西班牙人是委内瑞拉民族构成成分的客观事实,开始慢慢承认西班牙人对委内瑞拉多元文化的贡献。

整体而言,在委内瑞拉学界普遍认为玛利亚·莱昂扎崇拜是殖民征服时期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和黑人冲突的产物。三个族裔、三种文化的碰撞,创造性地产生了莱昂扎“三位一体”宗教,其中融合了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印第安人的瓜伊卡普洛神^[21]和黑人菲利普神^[22]。因此,莱昂扎崇拜本身就体现了委内瑞拉民族混血和文化融合的特点。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国内的移民浪潮,莱昂扎崇拜从国家中西部的亚拉奎州扩展到全国,逐步成为委内瑞拉各族裔共同崇拜的保护女神。每年的10月12日^[23],社会各阶层各族裔的人都会到索尔特山——莱昂扎崇拜的发源地。不管是印第安人、白人、黑人还是印欧混血种人,他们都认同、爱戴莱昂扎,就像热爱自己的母亲。正如那些朝圣者所说:“莱昂扎信仰象征着族裔的多元化,我们尤其为此感到自豪,这也恰恰是我们认为这种宗教具有开放性和整合性特点的依据之一。”“莱昂扎信仰超越了阶层和种族的区隔,被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所包围。”^[24]因此,在历经数个世纪以后,对玛利亚·莱昂扎的崇拜已经成为委内瑞拉民族主义的象征。

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新的政治、经济和城市生态,传统文化在适应现代性的过程中,不断作出调整与改变。此时的莱昂扎崇拜已不像原来那般原始暴力,但有一个简单的宗教仪式却一直保留着,叫“净化”(depuración),即在圣水池接受清水的洗涤。^[25]委内瑞拉民众普遍认为,莱昂扎崇拜是一种古老的信仰,它与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委内瑞拉历史有着根本的联系。而“净化”的意义就在于寻找委内瑞拉人最初的起源。然而到了20世纪,这个仪式的传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确定委内瑞拉人的身份,或者说回答独立后的委内瑞拉人是

谁的问题。新兴的委内瑞拉民族不是西班牙人到达之前的印第安人,他们有印第安人的基因,但同时也有欧洲白人和非洲黑人的血统。可以说,委内瑞拉人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有机结合的产物。由此,委内瑞拉政府顺势而为,确认了莱昂扎这一民间社会整合资源的价值,因为莱昂扎塑像融合了欧洲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形态特征;莱昂扎印欧混血的脸庞象征这个国家混血民族的主体地位,欧洲白人和印第安人是今日委内瑞拉民族构成的重要部分,任何一方都不能被否认;而她肌肉发达的身躯,则象征着黑人的体魄,这也是对非洲裔黑人的尊重,尽管黑人在委内瑞拉的人口比重不像在美洲和一些加勒比岛国那样大。由此,这尊族裔三合一、文化三合一的莱昂扎塑像便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回答了委内瑞拉人是谁的问题。国家试图借由这个有关集体想象的民族象征符号达到加强各族裔相互认同和对委内瑞拉民族的共同认同,进而加强委内瑞拉的民族建构。

(三) 莱昂扎塑像的功能与象征价值

莱昂扎塑像的建造,加速了她及其负载的意义和价值在全国,尤其是在大城市的传播。在首都加拉加斯,人们常常会带上鲜花、蜡烛和香薰来到莱昂扎塑像前祷告,在这些人群当中,既有西班牙裔和印欧混血种人,也有印第安人和非洲裔黑人。这种完全自发的、具有普遍性和生活化的行为,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行为习惯与情感需求,这个细节也反映出人们对她的虔诚信仰和对塑像的意义认同。

一般而言,集体认同的建构者及其建构的目的,大致上便决定了这种认同的象征性内容,以及它对接受或拒绝这个认同的人的意义。^[26]在委内瑞拉,西班牙裔、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裔长期不和,为了促使各族裔团结,委内瑞拉政府巧妙地以一个民族象征符号,进行了一次潜移默化的民族整合教育,即将三种族裔和三种文化统一于一体,让人们在体验艺术感染力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认同心理,产生一种团结统一的

统合性心态。更进一步来说,在委内瑞拉人民眼中,莱昂扎塑像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品,而是委内瑞拉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英国人类学家尼达姆(Rodney Needham)说:“所谓象征,就是以一事物代表另一事物,就像王冠代表君主制、鹰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一样。”^[27]

在现代社会,国旗、国徽、国歌等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物,它能整合和凝聚全体社会成员,因为它所指涉的内容是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的历史记忆和精神感情,人们认同它,并有义务捍卫它。此外,宗教象征也起着统一、凝聚和整合的作用,尤其在封建社会,它往往被视作国家合法性的来源。莱昂扎的美丽传说和宗教信仰为雕塑家科里纳提供了灵感,他将一个宗教符号转变成了一个民族象征,而且这个民族象征在得到各族裔的认可之后,逐渐变成了一个日常化的文化符号。如今,玛利亚·莱昂扎在委内瑞拉是一个高度大众化的形象,她并不局限于宗教领域。和西蒙·玻利瓦尔一样,她的形象常常在艺术、广告、公共领域甚至是政治场域里,被提升至民族符号的高度。^[28]而且,她的形象还变得越来越多元。虽然人们认为玛利亚·莱昂扎崇拜起源于对印第安人女神雅拉的崇拜,但现在她却常常被描绘成一个白人女性形象,头上戴着王冠,右手拿着玫瑰和旗子,上面写着她作为女神的使命:水源的保护者和丰收女神。除了白人女性形象,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她也常被塑造成印第安人、混血种人或黑人的样子。^[29]玛利亚·莱昂扎的形象,已成为委内瑞拉共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象征,也是促进委内瑞拉民族团结和发展的重要凝聚力量。

三、路径与启示:认同建构符号的悄然运用

玛利亚·莱昂扎塑像作为一种物质性表现体,本身即蕴含着族裔三合一、文化三合一的深层内涵。在当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议题中,玛利亚·莱昂扎塑像作为民族认同建构符号衍生出这样的启示:国民认同(民族认同)并非只是

抽象之物,它可以借助多元性“文化景观”的可视性教育和象征性符号来具体建构,还需通过持续濡化、影响国民,演化为国民群体的内在精神和行为规范;也需要树立民族平等的观念和原则,通过对多样民族文化内容的汲取和吸纳,不断推进多民族(族裔)国家的族际整合、文化整合与社会整合。

(一) 可视性教育载体与象征性“符号”的建构

从规范性视角来看,莱昂扎塑像的建造蕴含着丰富的符号学内涵。莱昂扎塑像作为一个民族象征性符号,将三种族裔和三种文化统一于一体,而委内瑞拉政府巧妙地以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视觉符号,对人们进行了一次潜移默化的民族团结教育,让人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认同心理,产生一种团结统一的心态。可以说,在委内瑞拉人民眼中,莱昂扎塑像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品,她体现了委内瑞拉官方对上述三个族裔持平等、团结的态度和立场,这种立场与态度,反过来又会促使他们消解对于彼此的隔膜与疏离,秉持一种包容性心态去重新审视和看待彼此,而在这种走向包容、亲近的社会氛围中,委内瑞拉国民的统合性精神也就寻找到了它的生长空间。

洞察于更开阔的视角,拉美各国的民族过程相似、民族成分相似、民族文化相似,以文化符号来体现和加强民族国家建构在拉美并非个案。例如,在墨西哥,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公共壁画(1910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在政府的推动下,一大批墨西哥艺术家在公共场合创作大型壁画,借此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民族自信心,20世纪20—40年代是墨西哥壁画运动的繁荣时期)、构建于50年代的三种文化广场(三种文化广场由三种不同时代的建筑物组成,分别代表了古老的阿兹特克文明、西班牙殖民文化和墨西哥现代文化)和建成于1976年的瓜达卢佩圣母教堂(瓜达卢佩圣母是墨西哥的国家守护神,她的形象是天主教圣母玛利亚和印第安人的众神之母托南琴二者的有机结合),等等,这些都是国家基于民族文化多元的现实和民族混血

的特性创造出的国家象征符号。在拉美其他国家,也有许多表达人民爱国感情、怀念本民族英雄的纪念性雕塑作品。如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城中的那尊拉美解放者玻利瓦尔跃马奔驰的大型雕像;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广场上耸立的拉美民族英雄圣·马丁的铜雕像;智利首都街道屹立的智利国父奥希金斯将军;等等。^[30]这种构建可视性民族象征符号的一般经验具有借鉴价值。而从发生学的视角分析,在生活化的氛围下,国民可能会受到直观的影响与濡化,更容易接收和接受教育。从这个角度来看,比起行政化的政策语言,这种基于民族性符号塑造多元性“文化景观”的可视性教育的长处与优势不言自明,它往往具有润物无声的春风化雨般的“悄然性”作用,因而是培育、深化全体国民认同心态的重要依托与载体。

(二) 国民认同的价值依循

委内瑞拉独立初期,为了完全区别于欧洲与邻国,在很大程度上选择放弃和忽视西班牙殖民时期留下的文化遗产,同时重新评价印第安人在国家历史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合法性的来源。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印第安人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所遭受的苦难是人类历史画卷中最野蛮的一帧,更重要的是,国家想要尽快完成自己的民族身份建构。然而,这不利于委内瑞拉的族际团结,从而也会最终影响国家的整合。这一点,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初期的族际关系中可以窥见。

殖民时期的委内瑞拉是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来自半岛的西班牙人处于社会的最顶端,其次是土生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最底层的是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殖民的历史是混血的历史,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和黑人在不断的对立冲突中加深着彼此间的矛盾与裂痕。独立后的委内瑞拉,土生白人和印欧混血人取代西班牙人,掌握着国家政权和财富;印第安人大多生活在村落,处于边缘状态,享受不到社会福利和医疗服务;奴隶制废除后,黑人在委内瑞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他们没有土

地,受教育年限少,失业率高,仍旧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因此,委内瑞拉的族际矛盾依然突出,社会裂痕始终没有弥合。可见,虽然混血的历史在客观上形成了今天的委内瑞拉民族,但族际间的矛盾对立必然会加深民族间的隔阂,这不利于民族的团结巩固和国家的统一。

委内瑞拉诗人安德烈斯·埃洛伊·布兰科在1944年说过:“在委内瑞拉,没有人能断言自己是纯粹的白人,所有人都有一滴黑人的血统,因为委内瑞拉人都是‘加牛奶的咖啡’。”^[31]正如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都是委内瑞拉混血民族不能否认的民族构成成分一样,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也是委内瑞拉共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国家的建构逻辑,不是放弃客观存在的多元文化内容,而是要肯定和尊重每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历史地位,以各民族平等的思想建设一个共同享有的国家。民族矛盾虽主要源于利益问题,但认同共有的历史、共享的文化也是缓解民族矛盾、加强民族认同的重要方面。因此,1951年由委内瑞拉政府组织建造的玛利亚·莱昂扎塑像,就是本着各民族平等的思想创造了一个为不同族裔都接受的认同符号。雕塑家科里纳的成功就在于,他将不同族裔、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都融入于一体之中,不分彼此,没有高下,从而得到了全体委内瑞拉人的认同。

四、结 语

玛利亚·莱昂扎塑像融合了委内瑞拉各族裔的特征,古老的印第安文化、西班牙文化与黑人文化共融于一个雕塑中,象征着委内瑞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和兼容并包的民族特征。这种既包含文化“对立”同时又消弭文化对立的象征性符号,对加强民族认同和多民族国家建构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塑像的建造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的族裔问题。进入现代社会,“混血民族”逐渐成为政府高举的一面旗帜,这种“种族民主”大大减少了因肤色的深浅而产生的歧视和偏见。与之相对应的,社会

地位取代了种族立场,成为确定社会个体差异的最显著标志。人们凭借自己获得的财富、官职以及所受教育,在不同的社会等级间流动,是富人、中产阶级,还是穷人,取决于他所属的社会阶层,而与肤色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真正解决多族裔的和谐发展问题,实现社会整体性的有机团结,就必须确保社会各阶层间的平等公正。独立解决了自由的问题,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存续,仍然使社会长期陷入松散乃至疏离状态。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保障各族裔人民平等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使国家财富的增长切实转化为国民的幸福生活,并使各族裔成员对国家抱以衷心认同,才能真正解决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冲突,进而实现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稳定与长治久安。

收眼于委内瑞拉的玛利亚·莱昂扎塑像,感悟于国民认同建构的符号功能,我们不由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所指出的,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32]这也要求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要善于发挥象征性符号的悄然聚合效应。

注释:

[1]1910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墨西哥政府开始推行“国族整合”政策(integración nacional,也可译为国族一体化)。该政策的理论构想,来源于19世纪20年代墨西哥人类学家曼努埃尔·卡米欧等人提出的“国族一体化”理论。所谓“国族一体化”,是指在承认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前提下,通过对包括原住民和混血族群在内的所有民族宣传祖国情感,将原住民纳入国家主流社会,使之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从而构建一个包括所有墨西哥人在内的一体化文化。参见李毅夫、赵锦元:《世界民族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54页。

[2][19][25]Ferrández Martín, Francisco, “El culto de María Lionza en Venezuela: tiempos, espacios, cuerpos”, *Alteridades*, vol. 9, núm. 18, 1999, pp. 39 - 55.

[3][30]郝时远、赵锦元主编:《世界民族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1、214页。

[4] Troconis de Veracochea E, *Documentos para el estudio de los esclavos negros en Venezuela, Fuentes para la Historia colonial de Venezuela*, Academia Nacional de la Historia, Caracas, Venezuela, 1969, p. 348.

[5] 梅斯蒂索人(mestizos)——西班牙语,意为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

[6] 穆拉托人(mulatos)——西班牙语,意为西班牙人与非洲黑人的混血。

[7] 桑博人(zambos)——西班牙语,意为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的混血。

[8] Arellano Moreno A, *Orígenes de la Economía Venezolana*, Ediciones de la Biblioteca Central de Venezuela, Caracas, Venezuela, 1982, p. 400.

[9] 克雷奥尔人(criollos)——西班牙语,意为出生在美洲的西班牙人,也称土生白人。

[10][委]吉利尔莫·莫隆:《委内瑞拉史》,[英]约翰·斯特里特编译,吉林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37页。

[11][14][16] María Ramírez Delgado, *El reordenamiento del pensamiento venezolano a partir de la doctrina del Nuevo Ideal Nacional de Marcos Pérez Jiménez*, <https://www.fundacionciev.com/reordenamiento-del-pensamiento-venezolano-partir-la-doctrina-del-nuevo-ideal-nacional-marcos-perez-jimenez/>.

[12] 考迪罗(caudillo),在西班牙语中意为“首领”或“头目”,但在拉丁美洲历史中,是特指19世纪初叶和中叶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代表地主(庄园主)利益的,并在一个时期内掌握了国家或地方军政大权、对人民能够生杀予夺、具有独裁性质的军事首领;而以考迪罗为头目实行的那种政治制度则称为考迪罗主义。参见张家哲:《拉丁美洲文明:从印第安文明到现代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13] Horacio Gaggero & Alicia F. Garro & Silvia C. Mantiñan, *Historia de América en los Siglos XIX y XX*, Aique, 2001.

[15][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9页。

[17] 阿方索·佩雷斯·门德斯著、田阳译:《拉美大学城的政治、建筑及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以墨西哥大学城和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大学城为例》,《新建筑》2015年第6期。

[18] Coronil, Fernando, *The Magical State: Nature, Money and Modernity in Venezuel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7.

[20] Yubiza Zúrate, María Lionza y el Sincretismo, https://vitaecv.ucv.v-e/pdfs/VITAE_2494.pdf.

[21] 瓜伊卡普洛(Guaicaipuro),最具代表性的印第安人酋长,在抗击西班牙人的殖民侵略中,作战英勇,被视为民族英雄。

[22] 黑人菲利普(Negro Felipe),独立战争时期,玻利瓦尔军中唯一有军衔的黑人。

[23] 莱昂扎崇拜最重要的朝圣日,也是委内瑞拉的种族日和印第安人抵抗日。

[24][28][29] Roger Canals, “¿Más allá del dualismo? Reflexiones sobre la noción de cuerpo en el culto a María Lionza(Venezuela)”, *Revista de Dialectología y Tradiciones Populares*, vol. LXVII, núm. 1, 2012, pp. 241-266.

[26] 李捷、张露:《论国家统一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7] 宗争主编:《民族符号学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31] Wright WR, “Café con leche”: *Race, Class and National Image in Venezuel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TX, EEUU, 1990, p. 167.

[32]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9年9月28日。

[责任编辑:刘姝媛]